

# 比较现代化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

谢春涛

**[摘要]** 面对逆全球化思潮与西方话语霸权，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本质在于掌握现代化的定义权，打破西方对现代化的叙事垄断，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理论升华。这不仅有助于为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困境开辟可行路径，也有助于为西方发达国家应对现代化危机提供反思镜鉴。构筑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的关键，在于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历史实践，“第一个结合”奠定了国家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基石，“第二个结合”则深刻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内在生命力，进而催生出有别于西方范式的现代化新图景与文明形态。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 话语体系 叙事体系 “西方中心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sup>①</sup> 这一重要论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与必然趋势，从根本上超越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窠臼，既体现了对“西方中心论”现代化叙事的批判性超越，也蕴含着对多元现代化路径的创造性探索。因此，唯有构建起兼具解释力与传播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才能在文明对话中打破“他者化”的认知壁垒，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的理论意涵

“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西方理论正在被质疑，一种新版的马克思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25CDJ045）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93页。

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sup>①</sup>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相关重要论述，作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批判“西方中心论”的有力武器。所谓“西方中心论”，是一种以西方文明为核心的历史观、文化观和意识形态，其核心在于将西方文明模式视为衡量一切文明的唯一标尺、现代化的唯一源头及人类发展的终极归宿，将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现代化路径普遍化、绝对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意在重新定义现代化范式和道路的内涵，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物质进步与精神富足、个体发展与集体福祉之间的有机统一。其叙事体系则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道路阐释的长期垄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独立自主的发展范式。这一理论创新不仅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也为全球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 （一）重塑内涵：建构超越西方的现代化话语

在全球话语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就是掌握现代化的定义权与话语权。这不仅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关键，也是塑造文明交流格局的核心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sup>②</sup>。这为我们思考和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既要立足于现代化的普遍共识，又要鲜明彰显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优越性。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于重新审视并丰富现代化内涵，打破西方现代化话语的定义垄断，为全球现代化进程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参照。

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应当展现现代化的共性特征，以实现真正的文明对话。“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追求。”<sup>③</sup> 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非外在于世界现代化浪潮，而是对其普遍规律的遵循与发展。它同样追求物质丰裕、精神富足、制度健全，体现出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普遍性特征，包括现代大工业、现代价值、世俗化、社会分工与流动、城市化、全球化、教育普及、法治化等<sup>④</sup>。这正是近年来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巨大成就的内容——比如先进的基础设施、便捷安全的生活、高效的社会治理——能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的深层原因。这些现代社会的象征，有力地反驳了部分西方媒体长期塑造的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揭示了西方话语体系的偏见与漏洞。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文明形态，其成功实践验证了非西方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并内蕴着“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sup>⑤</sup>，为跨文化沟通奠定了实践基础。以事实和理性纠正西方意识形态工具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抹黑与歪曲，才能打破西方对现代化定义的垄断。

①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75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8页。

③ 《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人民日报》2024年9月6日。

④ 参见吴忠民：《关于现代化概念的再认识》，《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25页。

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更应展现自身的独特性与先进性。西方的现代化话语，本质上是西方以殖民暴力和技术优势建构起来的“文明等级论”。西方社会将工具理性主导的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等制度安排，巧妙包装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形态。而与之相对，非西方社会被贬斥为落后、野蛮、专制的前现代“他者”。依托殖民体系，“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很难区分欧洲现代性的特殊性和普适性”<sup>①</sup>。但是，这一霸权话语的悖论在21世纪全球秩序重构中愈发凸显。西方社会不仅未能兑现其自我标榜的“历史终结”图景，反而陷入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现代化困境：科层制和工具理性如同“铁笼”压缩个体的精神自由与价值追求<sup>②</sup>，进而引发世界性的愈发严重的现代化危机。更为关键的是，正是西方构建的现代化标杆认知陷阱，迫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双重困局，或因盲目模仿西方模式而陷入动荡、停滞与腐败，或因坚持自主道路而被西方排斥于“现代文明”之外。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必须承担起重构多元现代化理论框架的时代任务。

对于西方文明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优势在于重新定义了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属性。与西方文明不同，人类文明新形态并没有放任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膨胀，而是有意识地对工具理性进行价值引导，同时大力推动体现集体福祉与长远目标的价值理性的制度化，以此应对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逻辑可能将人类推向分裂、动荡乃至意义虚无的风险。当前，“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sup>③</sup>。世界各国面临经济复苏乏力、发展鸿沟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冷战思维回潮等多重挑战。个人主义的极端化与工具理性的宰制，被许多思想家视为西方现代化内在困境和危机的核心症结，这恰恰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异化的深刻洞见。但是，尽管西方社会内部不乏对其现代化模式的深刻反思与批判，这些批判却未能从根本上阻止其内在矛盾的激化与蔓延，发展中国家也未能从这些批判中寻得摆脱困境的可行方案。

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旨在直面“时代之问”与“世界之问”，以其对现代化的深刻再定义和实践创新，为世界提供一种超越西方模式、更公平、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且充满生机活力的现代化新选择，践行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sup>④</sup>的历史使命。

## （二）打破垄断：确立非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叙事

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叙事体系，其根本任务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理论化与体系化表达，使之不仅作为一种历史经验，也上升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发展范式。相较于西方殖民扩张、资本垄断的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历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叙事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依附性发展的束缚，为发展中国家探索自主现代化提供了理论范式与实践参照。这一

① [英] 马丁·雅克：《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孙豫宁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8页。

② 参见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7页。

③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进程不仅解构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认知霸权，也在文明互鉴维度开创了多元现代化的新可能。

西方现代化叙事长期将自身特殊的历史经验普遍化、“普世化”，企图以其制度模式、价值理念、文化精神来衡量甚至取代其他文明的发展道路。这种“理论殖民”的背后，是先发国家借助自身主导地位对现代化叙事的垄断。如马丁·雅克所言，西方现代化建立在外部威胁的相对缺乏、殖民主义、工业优势、相对缓慢的增长、欧洲的内部冲突和个人主义基础之上<sup>①</sup>，这些条件不可复制且不可推广。但长期以来，通过教育、传媒、援助、外交等手段，西方现代化路径以其资本主义制度、个体主义文化与殖民扩张史为基础，构建了将自身发展经验普世化的“单一路径论”，形成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叙事霸权。其根源正如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B. Marks，译名“马立博”）所言，欧洲殖民者征服美洲文明后，坚信有且只有欧洲人掌握了现代化的密码。“欧洲由此获得了向全球扩散‘现代性’的道义和权力，欧洲之外的地方则因文化的、政治的或经济的‘障碍’而无法独立自主地产生‘现代性’。”<sup>②</sup>在巨大的发展差距面前，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sup>③</sup>。他们相信，只要沿着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前进，后发国家也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现代化。

但是，历史反复证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是不可复制且代价惨痛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国情和历史条件，全盘照搬西方模式，结果水土不服，绝大多数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社会政治动荡的困境。”<sup>④</sup>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阿拉伯之春”的后果表明，脱离本国社会结构与历史传统的制度移植无法支撑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发展。西方式现代化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这也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和“技术依附困境”。尽管西方现代化叙事体系存在诸多问题，但由于长期缺乏替代性的成功范例和有说服力的叙事体系，“西方中心论”仍然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着强大的话语主导权。

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叙事体系构成了根本性挑战，并实现了理论超越，为现代化范式的深度重构奠定了实践基础。它首次以非西方国家的制度路径、文化传统与发展模式，取得了人口规模最大、经济增速最快、减贫成效最显著的现代化成就，为打破西方现代化叙事的垄断提供了正面案例和范式替代。

从发展成效来看，自1978年以来4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GDP年均增长率约8.9%，经济总

① 参见〔英〕马丁·雅克：《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孙豫宁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8页。

② 〔美〕马立博：《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夏继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页。

③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93页。

④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94-295页。

量跃居世界第二，使超过8亿人摆脱贫困<sup>①</sup>；中国在高铁、5G、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从追赶到领跑，国家创新能力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3年的第10位<sup>②</sup>；中国构建起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常年在30%左右<sup>③</sup>。这一系列成就彻底驳斥了西方人认为“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只会在科技上依赖和模仿西方、不具创新能力的成见”<sup>④</sup>，突破了长期束缚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依附困境”，验证了自主创新能力与路径选择的可行性。

从现代化的路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其根本优越性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处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关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式现代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遏制了资本的无序扩张，致力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以少数人获利为目的、造成人与社会及自然全面异化的掠夺式发展形成了本质区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六对重大关系——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sup>⑤</sup>。这不仅是对今后工作的要求，也浓缩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经验：比较而言，中国将顶层规划与基层创新相结合，西方主要依赖市场自发秩序；中国坚持长期稳定战略与灵活策略统一，西方则往往追求短期利益而缺乏战略定力；中国追求效率与公平相促进，西方片面追求效率导致严重不平等；中国实现活力与秩序平衡，西方则在“左”和右之间拉锯对立；中国坚持自主发展同时高水平开放，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却愈演愈烈。与西方现代化常常陷入二元对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秉持系统性、整体性、辩证性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sup>⑥</sup>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证明，现代化并非只有一条道路，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恰恰为现代化探索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可能。

## 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的世界意义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在这一关键历史节点，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具有格外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价值不仅体现在理论的突破与创新，更在实践层面为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复杂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一方面，它为

① 参见康义：《七十五载砥砺奋进 鉴往知来再启新程（人民要论）》，《人民日报》2024年9月25日。

② 参见吴月辉：《国家创新指数报告显示 中国创新能力升至第十位》，《人民日报》2023年11月22日。

③ 参见《“十四五”时期——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人民日报》2025年7月10日。

④ [美]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374页。

⑤ 参见《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236-239页。

⑥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94页。

反思并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内在的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与价值理性持续衰微之困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明镜鉴与发展范例；另一方面，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破解依附困局、重塑文化自信指明了一条自主自强的新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构建与之相匹配的崭新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不仅具备充分的现实可能性，更具有紧迫的时代必要性。

### （一）超越内在矛盾：为破解西方现代化危机提供镜鉴

面对价值理性失落和个人主义膨胀带来的贫富分化、精神贫困、社会分裂、生态危机等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给出的答案是被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称为“后物质主义”的文化转型，即后工业社会出生的世代更加强调个体自由和自我表达，“环境保护、堕胎、种族冲突、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已成为当下的热点话题”<sup>①</sup>。这种转型一度推动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却无法解决西方经济霸权衰落与移民问题带来的挑战。于是，西方社会出现了大资本与工人阶级结合的新保守主义，其与后物质主义带来的“政治正确”的对立使欧美的政治极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思想和政治上的困境，恰恰证明了西方现代化话语的局限性。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建构，将为人类文明应对现代化危机提供新的思路。

经济层面，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sup>②</sup> 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必然导致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在全球化的当代，这一矛盾表现为更为复杂的形态：金融资本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不断吹高资产泡沫，进而导致产业空心化，大量中产阶级失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阶层固化趋势日益凸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理性的信仰遭遇严重挑战，传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框架无力应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深层次矛盾。这并非偶然的政策失灵，而是资本逻辑支配一切社会生活、物化逻辑压倒人的解放这一价值目标的必然恶果。

与此相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则展现出对工具理性的有力引导和对共同富裕这一核心价值理性的制度化追求。中国坚持将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基”<sup>③</sup>，强调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同时，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致力于实现更为公平包容的增长。将共同富裕明确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成功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并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不仅夯实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更体

① [美]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79-380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78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58页。

现了对工具理性的超越和对共同富裕的追求。

政治层面，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表现为形式民主的过度程序化与空洞化，由此导致“民主失灵”与治理失效。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无法实施有效统治的问题也临到了美国自己头上”<sup>①</sup>。西方民主制度在设计上过于强调权力制衡的程序和机制，却忽视了民主的实质内涵——人民当家作主。这种形式民主在当代面临多重困境：一是“否决政治”导致的治理效能低下，政策制定与执行陷入长期僵局；二是金钱政治与利益集团的渗透，使政治系统越来越成为富人的游戏；三是身份政治的泛滥导致社会极化加剧，民粹主义与右翼保守势力抬头，加剧了社会撕裂和治理混乱。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sup>②</sup> 民主的异化，正是西方现代化危机在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也反衬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倡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越性。

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将人民当家作主、国家长治久安等价值要求深度融入政治制度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核心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重视程序建设和法治保障，更强调民主的实质内涵：确保国家权力真正为人民服务，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的实现，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有效治理与充满活力的民主相统一。这旨在克服西方民主互相掣肘、流于形式的弊端，为现代国家治理提供了强调实质民主与治理效能相结合的新范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关键在于“八个能否”，即能否实现领导层有序更替、人民依法管理各项事务、诉求顺畅表达、社会有效参与、决策科学民主、人才公平竞争、执政党依宪依法领导、权力有效制约监督等实质性成果<sup>③</sup>。实践证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探索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新样态。

文化层面，西方现代化的危机集中体现为意义系统的解体与道德基础的侵蚀。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笔下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带来的“意义的丧失”和“目的的晦暗”<sup>④</sup>，造成了西方日益严峻的精神危机与价值分裂：一是移民问题和多元文化发展冲击了原有认同体系，身份政治非但没有化解矛盾，反而加剧了社会分裂；二是“政治正确”在实践中走向另一个极端，制造了新的不平等；三是曾经支撑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伦理在后工业社会和消费主义的冲击下逐渐式微，“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sup>⑤</sup>。因此，汤因比曾寄希望于东方文明，认为中国具有将亿万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的经验，

① [美] 弗兰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98页。

② 习近平：《论人民当家作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36页。

③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22页。

④ [加拿大]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练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1页。

⑤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77页。

能为现代社会提供“一种新的精神基础”<sup>①</sup>。

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重新激活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的价值理性传统。这一文明形态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注重集体、强调和谐、崇尚道德的精神特质，同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积极回应时代要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力量。“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sup>②</sup> 人类文明新形态旨在为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提供坚实的意义体系和价值引导，既尊重个体发展，又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有效抵制极端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侵蚀。这种努力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文化危机的因应，也为人类寻求精神家园探索新路。

生态领域，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西方主流环保政策主张通过技术创新和自然资源市场化解决生态危机，而非反思过度消费和资源掠夺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将生态问题工具化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更为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则“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把人类文明与生态保护对立起来”<sup>③</sup>，本质上是反人道主义的。而无论是哪一派观点，环境保护在西方常常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无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范式统摄。在认识论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sup>④</sup> 这就是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有机宇宙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形成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整体性思维。在制度设计层面，通过生态红线、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等制度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将生态价值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在发展范式层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sup>⑤</sup> 的辩证发展观，打破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二元对立。通过国家力量系统性地引导和规范工具理性的运用，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立为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探索可持续的现代化新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sup>⑥</sup> 因此，构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不仅有助于反思现代化、推动现代化理论的创新，也为身处现代化困境的发达国家提供了反思自身模式、寻求变革的重要参照。阐释好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特征与优越性，打破西方对现代化的定义垄断，将其打造成人类应对现代化挑战的文明样板，一如毛泽东提出的，将陕甘宁边区打造成“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sup>⑦</sup>。这既是巩固自身文明自信的需要，也是对世界文明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① [英] A·J·汤因比、[日] 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294、149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页。

③ 王雨辰：《论西方绿色思潮的生态文明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页。

⑤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9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81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1页。

## （二）突破依附陷阱：为全球南方国家开辟自主发展新路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高度绑定的时代，发展中国家在探索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如何看待西方现代化的问题。全球化不仅是商品、资本、技术的流动，更是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的输出<sup>①</sup>。但是，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并没有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反而加剧失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全球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百分之九十九人口财富的总和。”<sup>②</sup> 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难以跨越的依附性陷阱，其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建设将为发展中国家探索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可能性。

关于诸多后发国家的失败，除了制度缺陷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西方学界还有两种观点影响深远。一种是以依附理论为代表的左翼学者，阐发了马克思提出的“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sup>③</sup> 的国家间剥削理论，认为中心国家（发达国家）通过对技术、金融、自然资源开发、媒介通讯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占据了高附加值产业领域。而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主要依赖出口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并且其生产性劳作的价值被系统性低估，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底端，难以积累资本并实现自主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类观点的激进派认为，外围国家的不发达是“永久化并且加剧”<sup>④</sup> 的，除非彻底脱离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否则无法摆脱被剥削的命运。依附理论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等性，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缺陷在于过度强调外部因素，忽视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且其“脱钩”主张在现实中难以实现。

作为对传统依附理论的修正与发展，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通过“中心—半边缘—边缘”三级结构和长时段分析改良了依附理论，提出边缘地区可以通过发展“上升为半边缘地区”<sup>⑤</sup>，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成功提供了解释框架。基于此，“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全球化是世界其他国家日益西方化的过程，即接受自由市场、西方资本输入、私有化、法治、人权制度和民主规范的过程，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sup>⑥</sup>。但是，这种模式的成功并没有扩散到其他国家，因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均在战后被纳入了美国和西欧所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地缘政治上均作为美国的盟国或盟友而受到后者的保护”<sup>⑦</sup>。而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这种地缘政治待遇，西方化的道路往往意味着持续受困于金融霸权、技术封锁和不平等的贸易规则。本质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虽然更为精细，但仍描绘了一个需要边缘地带的廉价资

① 参见〔英〕杰弗里·萨克斯：《全球化简史》，王清辉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第3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2页。

④ 〔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32页。

⑤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63页。

⑥ 〔英〕马丁·雅克：《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孙豫宁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XXVIII页。

⑦ 〔美〕李怀印：《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203页。

源和劳动力来维持中心繁荣的等级体系，并未提出能够打破这种不平等结构的有效方案。

另一种以文化决定论为代表的欧美学者，则承袭了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研讨，认为文化价值观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劳伦斯·哈里森（Lawrence E. Harrison）以《不发达是一种心态》为名撰写了一本著作，戴维·兰德斯（David S. Landes）也在其著作中强调，正是文化使局面完全不一样，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和态度能够引导民众<sup>①</sup>。他们认为，西方新教文化中的勤俭、理性、守信等伦理观念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成绩，也是类似的文化因素在发挥作用。反之，拉美等地区由于缺乏类似的文化基因，因此难以实现现代化。文化决定论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但也容易遮蔽制度变革、国际环境、阶级结构等其他关键变量；同时，它忽视了对文化形成的探讨，塞缪尔·亨廷顿等人所谓的“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sup>②</sup>的观点，本质上也带有唯心主义循环论证的色彩，容易陷入静态、本质化的文化观；更重要的是，它以西方文化为唯一标准来评判其他文化，无形中巩固了西方的文化霸权，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主体性造成严重冲击，成为引发社会动荡与文化断裂的重要根源。

上述西方理论观点，要么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在面对西方文化时往往缺乏独立性，要么将现代化和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但反过来看，这些理论和叙事恰恰印证了，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摆脱外部依赖和内部动荡，找到一条符合自身国情、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艰巨而困难的探索。基于此，对中国式现代化经验进行深入总结和理论升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多元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对于打破西方现代化话语和叙事的垄断，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表明，突破“依附”并非意味着与全球化脱钩，而是要辩证地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中国没有在开放国门之后被动接受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地位，相反，独立自主扩大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战略方针。尤其是在面对西方的技术封锁和贸易壁垒时，党和国家更加坚定了科技自立自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决心。借助国家力量的战略引导、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以及持续的制度创新，中国有效整合全球资源，同时不断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sup>③</sup>。这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普世性”谬论，也突破了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困境。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叙事体系，应当系统总结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有效融入而非被动卷入全球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宝贵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在开放合作中实现自立自强”<sup>④</sup>的中国方案。

① 参见〔美〕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732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8年，第3页。

③ 《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6页。

④ 参见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0页。

从文化决定论的视角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历程证明，文化是动态的演进过程，文化的现代化不等于被动接受西方文化。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将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曾广为流传；半个世纪后，东亚经济圈崛起，一些学者又提出所谓的“儒教资本主义”。“昨天的东亚因儒教文明的遗产而沉沦，今天的东亚又因同一儒教文明的遗产而崛起。”<sup>①</sup>这种截然相反的论断表明，文化并非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阶段会发挥不同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部既有促进现代化的要素，也有阻碍现代化的内容，关键在于如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怎样的制度、社会和思想条件，是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体系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无意也没有输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模式’，但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必然会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借鉴。”<sup>②</sup>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的建构，其根本价值不仅在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理论升华，更在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越西方现代化叙事垄断的思想武器和实践借鉴。这一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应当系统总结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基础上，充分挖掘自身潜力以及积极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重要经验，为人类的现代化理论提供具有世界意义的新的经典案例和发展路径。

### 三、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的关键：“两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sup>③</sup>这一论断富有哲学深意，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指明了方向。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内生动力，从而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新道路。以贯穿百年的“古今中西之争”来看，“两个结合”回答了中国“走什么路”和“怎么走”这两大现代化之问。

#### （一）“第一个结合”：奠定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基础

“古今中西之争”始于近代中国文明蒙尘之际，但争论的结果却也走向了文化决定论。在地主阶级改良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未能拯救民族危亡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转而从文化层面深掘病根，将文化选择视为中国道路的根本。梁漱溟曾指出：“中国的失败自然是文化的失败，西洋的胜利自然亦是文化的胜利。”<sup>④</sup>激进派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根源，是现代化的阻碍，进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539页。

②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95页。

③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7页。

④ 《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而提出“全盘西化”论；保守派则强调传统道德教化的优势，对西方文化持保留态度，主张“融合东西文明”<sup>①</sup>。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体系中，脱离政治经济侈谈文化改革终将陷于失败。对此，罗荣渠指出：“‘五四’以来关于中国出路之论争长期都是围绕东西文化之争这个题目兜圈子，而很少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弱点。”<sup>②</sup>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从经济政治的角度指明了跳出东西文化之争泥沼的现代化之路。唯物史观使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现代化首先要求消除传统的结构，建立一个适应现代化文明要求的社会结构”<sup>③</sup>。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批判性，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剥削本质，使中国共产党人得以超越西方物质发达的表象，认识到西方的现代化终将造就“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sup>④</sup>。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的愿景相契合，为中国人擘画了清晰的现代社会发展蓝图，破除了“西方中心论”的迷思。毛泽东早年思想的转变历程极具代表性，他曾回忆：“我崇拜过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sup>⑤</sup>但在经历了改良主义的失败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后，毛泽东转向了无产阶级革命，并且再也没有动摇过。

“第一个结合”为中国摆脱依附奠定了制度基础。在人口规模巨大、多民族且一盘散沙的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摧毁了旧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建立了一个领土和人口规模、组织力和凝聚力空前强大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性、本质性特征。在“第一个结合”的推动下，中国建立了“既大且强”的现代主权国家<sup>⑥</sup>，能够有效汲取和动员国内庞大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进而通过国家工业化的方式，“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sup>⑦</sup>。得益于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中国没有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形成垄断的利益寡头，也没有沦为跨国资本的附庸，而是不断地将经济增长的成果用于扩大再生产，不断实现产业链的攀升。可以说，正是“第一个结合”，奠定了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基石。

“第一个结合”为文化的现代化确立了发展方向。文化根植于特定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之中。在旧中国，传统文化很大程度上与封建宗法、地主阶级等腐朽势力紧密相连，必然受到旧的社会结构的牵引和制约。只有在长期独立且稳定的现代社会中，那些附着于旧制度的传统文化糟粕才失去了滋生土壤，中华民族才能够更加从容自信地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也只有

① 参见《吴宓文集：著作编》（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第15页。

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396-397页。

③ 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4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40页。

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1页。

⑥ 参见〔美〕李怀印：《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111-113页。

⑦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03页。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中华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才能被发掘利用并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换言之，“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传统文化免于同近代中国社会和民族的衰败一道走向没落”<sup>①</sup>。“第一个结合”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全新的社会环境，为积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sup>②</sup>确立了正确的方法论。

## （二）“第二个结合”：激活中华文明的内在生命力

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式现代化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面对物质发达的西方文明，“古今中西之争”再次成为焦点。一些人将中西之争视为古与今之争、落后与进步之争，中华文化的本位意识与文化自信被动摇。一味反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抬头，引发社会思潮的动荡。从更深层次来看，在全球化带来的西方物质文化冲击与自身工业化进程的双重驱动下，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常伴随着传统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的瓦解，进而导致精神世界的茫然以及对西方文明的崇拜心理。这一时期的“古今中西之争”，实质是“西方中心论”在当时中国的时代表达。因此，怎样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议题。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引起动乱。”<sup>③</sup>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越剧烈，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的断裂感越强，越容易产生社会动荡。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推动中国实现了迅速但平稳的现代化跃迁。

首先，那些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人忽略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思想的集大成者，本身就汲取了工业文明中理性、自由、平等和人的解放等现代化要素<sup>④</sup>。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催生了具有现代化特征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华文化注入了理性精神、平等价值观和解放思想等新的文化内涵，推动中华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其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更加平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及其追求的社会理想和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存在本质区别，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多维共鸣，“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sup>⑤</sup>。这种契合性在“第二个结合”中催生了文明创新，例如，革命文化熔铸了“旧邦新命”的开拓精神与自强不息的奋斗传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通过小康社会、以人民为中心等理念实现了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政治文明的融合。在“第二个结合”的推动下，各族人民积极构筑兼具中国特色与现代文明特质的、能够“使各民族

① 韩庆祥：《全面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

② 参见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28页。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7页。

④ 参见刘国胜：《重新理解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⑤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页。

人心归聚、精神相依”<sup>①</sup>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古今中西”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中国人能够在保有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吸收现代化观念，避免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撕裂。

最后，在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中，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得到化解，马克思主义逐步落地生根，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新的生机。毛泽东指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sup>②</sup>“第二个结合”的推进，赋予了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使中国式现代化从一种“外源式应变”的现代化转变成为“内生驱动”的现代化，推动中国社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历史证明，“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sup>③</sup>，历史悠长、积淀深厚的中华文明才能在与西方的接触中保持自主，进而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这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始终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应当以全球化的大历史观，系统阐释“两个结合”对于激活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动力的重要意义。“第一个结合”帮助中国摆脱了被动接受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叙事，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建立了革新的、安定的现代社会秩序，清理了旧社会中阻碍发展的落后因素，确立了进步的文化发展方向。而“第二个结合”则消除了“古今中西之争”的对立困境，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同时避免了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后难以弥合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赋予了中华文化新的生命力，进而跨越了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依附困境，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sup>④</sup>但是，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表明，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来之不易。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的建构，本质上是对现代文明范式的历史性重构。这种重构既非对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全盘否定，也不是过分强调特殊的地方性叙事，而是在批判性继承人类现代化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单一现代化叙事的根本超越。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在三个关键维度实现了范式突破：在哲学层面创立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的新型现代话语；在实践维度构建起独立自主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结合的现代化叙事；在文明维度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三个层面的创新共同构成了具有文明史意义的理论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谢春涛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

[责任编辑：杨彬彬]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9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

③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6页。

④ 习近平：《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2页。